

>> 德赛都

(Michel de Certeau)

“权宜利用”：使用和战术

尽管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阻止或隐藏，但“干私活”（或它的等价品）仍然四处蔓延，并且越来越普遍。而在所有的实践中，只有一种情况下，实践才是将艺术诡计及其同谋者的反抗导向一个由工作和休闲再造及分隔的系统，这就是“干私活”。它比狐狸还狡猾得多：总拥有无数种“权宜利用”之计。

从这个角度看，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分界就不存在了，这两个行为区域融合到了一起，相互重合、强化。通过惊奇（事件）、真相（信息）、交流（促销）的虚构，文化技术将自己伪装成经济的复制品，并在工作场合中传播。反之，由于理性操作允许通过划分（分析）、制表（综合）、聚合（普遍）的方式来管理工作，文化产品便为理性操作提供了一个扩张区域。除了根据场所（工作或是休闲）不同来分配行为，以此来进行区分外，事实上，还需要依据具体所处的社会棋格——在办公室、工厂，或者是在影院来区分。此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不同之处主要指行为模式及实践形式，他们穿越了将实践、地点和行为的类型进行划分并将之分配给工作与休闲两区的边界。举例来说，干私活就将自己移植到了工业流水线的系统之中（同一场所中，它的对应物），同时又干着其他地方即工厂外（另一场所）的活计。

虽然这些遁逃术 (transverse tactics) 能继续仰赖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 但是他们并没有遵循这些场所的法则, 因为他们并非由它来定义或识别。就这一点而言, 较之于试图建立与抽象模型相适应的场所的技术性战略, 遁逃术也同样不能被地域化。但在区分他们的同时, 又涉及了行为类型和空间角色的问题: 当这些行为发生时, 战略有能力制造、统计及强制这些空间, 反之, 战术只能使用、调整、顺应这些空间。

然而, 我们必须明确地阐明这些操作方案。正如在文学作品中, 人们能够区分写作的“风格”或写作方式, 人们也能区别“行为方式”——行走的方式、阅读方式、生产的方式、言说的方式等。这些行为风格介入了在第一层面规范他们的领域中 (比如, 在工厂系统的层面), 但是, 他们采用了一种使这个领域转向对他们有利的方式, 即遵循了另外的规则和制度, 类似于第二层面, 又夹杂着第一层面的东西 (如干私活)。这些“操作方式”与“使用说明”很相似, 通过一种不同的、介入性职能的形成,



▲《匹兹堡》系列, 史密斯, 1955-1956

操作方式在机制中建立了一种特定的作用。从而，一个住在巴黎或者是鲁贝（法国）的北非人，在低收入房屋建设或者是法语的建构中，潜入了这个被强加于他的系统中，而那种“栖身”方式（住房和语言）对于他本民族的卡拜尔语来说是特别的。通过组合，他将他们叠加起来为自己建立一个空间，在其中找到一种方式来使用地域及语言的强迫性规则。除了在这个地方居住下去，他别无选择，即使这里制定了专门针对他的法律。没有离开这个空间，他却创造了多元的、富有创造力的维度，也就是夹缝中求生存的艺术反而让他从这样的处境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结局。

随着文化传播现象及置换的扩张，这些使用或者再使用的方式增加了。置换是指取代了通过个人生活或工作地点来作为自我认同的方式、方法。这并不妨碍与“权宜利用”这种古典艺术的一致性。我将之视为使用，即使这个词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指那些被按照自己的“方式及传统”由集团所接受和复制的陈腐产品。问题出在词语的暧昧性上，这显然是由于对“使用”和“行动”的辨别（词语在军事上的意义），他们都有自己的程序及创造性，并且十分全面地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消费能力。

使用，还是消费

随后，大量著名的作品分析了“文化产品”、生产系统^①、分配的地理和消费者在这个地理中的位置^②，那么似乎就可认为这些产品不再仅仅是在流通统计后被写在表格中的数据，或者是经济的扩散作用中可被理解的数据，也是使用者在实现自我经营的存储中的组成部分。自此以后，这些事实就不再是我们流通中的数据，而是使用者实践的辞典。那么，一旦

^① 参阅胡特等的《机器文化》（巴黎，1977），不仅仅局限于分析产品（摄影、记录、印刷），也研究经济反复及意识形态自生产系统。

^② 参阅《法国文化实践》（巴黎，1974），卷二；阿尔温·托夫勒：《文化消费》（巴尔的摩，1965），本书保持基本性、先锋态度，但是并不以统计为基础，且受到大众文化研究的局限。

要分析电视上播放的图像和人们在观看电视所花费的时间,就要不断地询问在这段时间中消费者用这些图像干了什么?成千上万的人们购买健康杂志,还有超市中的消费者、城市空间的从事者、报纸的故事和传奇的消费者,他们究竟如何解释他们所“吸收”、接受及付账的东西?他们究竟如何处理它?

这是消费的斯芬克斯之谜。其产品通过电视图像、城市和经济生产扩散。他们又都是不可见的,因为建构的网络编织得越来越紧密,具有伸缩性和极权主义。在形式上又变化无常,随着周围的环境弯曲,而且可能消失在殖民组织中,但这些产品并没有给消费者留下任何可标记他们活动的空间。虽然孩子们会因为他们在作业本上乱涂乱画的行为受到惩罚,但是孩子照样是我行我素,因为他开创了自己的领地,像作家一样来标榜自己的存在。电视观众则不能在自己的电视机屏幕上写下任何东西:他始终是被驱逐在产品之外的,在这个幻象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失去了创造者的权力,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接受者,作为各种各样的自我崇拜的演员的镜子。推演到极致,他将成为工具的影像,不再被用来生产工具自身,“独身机器”(celibate machine)^①的复制品。

在现实中,理性化的、向外扩张的、中心化的,壮观而喧哗的生产会遭受一种完全不同的生产,即“消费”。这种生产具有以下一些特征:诡计多端,零敲碎打(这由环境所致),潜踪偷袭,隐而不露,总是在不知疲倦地悄悄活动。简而言之,由于它不现身于自己的产品(它能把它们放在哪里呢?)之中,而是展现在使用那些强加给它的作品的艺术之中,所以有些无从察觉。

在其他的社会中,这种由消费引起的小心而又根本性的倒置也一直在被研究。西班牙殖民主义对印第安文化的胜利是壮观的,但已偏离了原来

^① 在20世纪早期的艺术领域中(杜尚等)或文学领域中(从朱利斯·威恩到雷蒙·洛塞尔)具有预见性的主题——“独身体制”,参阅克莱尔等的《独身机器》(威尼斯,1973)。

预期的目的。即使当印第安人被征服时，实际是他们接受了自己被征服的现状时，印第安人仍时常运用那些通过武力和蛊惑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法律、实践及陈述得出不同于那些征服者的意义，他们在已有的意义之外得出了新的结论，从内部进行颠覆，不是拒绝或改变他们（虽然这也发生过），而是在那些外在于殖民主义的规章、习俗和信念的帮助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使用他们，虽然他们还是无法逃离殖民主义^①。印第安人隐喻了统治性的命令：令它在其他系统中发生作用。他们在这个系统中则始终保持着他者的身份，同化系统的同时也在外部被系统所同化，但印第安人并没有通过离开来回避。在占有者所构建的相同的空间中，消费生产仍然保持着不同性。

这是否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并不是。即使印第安人的抵抗仅是建立在对不断受压迫的过去的记忆上，但过去已深深地刻入了他们的身体之中。^②退一步来说，我们能在使用文化的“大众”背景时发现同样的过程，而这又是由制造语言的“精英们”所推广的，但这些被强加的知识与象征符号却又由那些并不是生产者的从业者所操纵。一定的社会战略生成的语言具有某种扩散能力，可将自己的战利品扩散到周围的广阔的环境，那里如“沙漠”一般，根本不存在所谓平等的表述。但这样做又会被一系列陷阱捕获，这些陷阱又是经解释后的常规所同化的，而对同样战争的胜利者来说他们都是不可见的，他似乎已经是胜利了。无论这个胜利是多么壮观，胜利者的特权只有作为顽固的、狡诈多端的日常实践的框架时才是显著的，即胜利是被利用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大众化”或“堕落”就是部分讽刺性的复仇，利用战术来呈现支配生产的力量。不管怎样，消费者不可能让他所同化的报纸或者是经济产品来确认或限制自己的身份：在个人（使用者）和这些产品（标志着被强加于他身上的“规

① 参阅蒙斯特：《虔诚的基督徒：艾马腊人》（巴黎，1969）。

② 参阅德赛都：《印花棉布》，见《拉丁美洲印第安文化复兴》，伊夫斯、马特恩等（巴黎，1969），119-135页。

则”)之间,存在着—道比例在不断变化的差距,这一距离又是通过人们生产出的产品的使用得以显现的。

那么就必须对使用本身进行分析。这并不缺少模型,尤其是关于语言的模型。事实上语言是一个特权区域,可以辨别出那些对实践来说是“专有”的正式规章。赖尔(Gilbert Ryle)借用了索绪尔(Saussure)对“语言”(体系)和“言语”(行为)的区分,并将前者喻为资金,将后者喻为使之成为可能的运营:一方面是大量的物质储备,另一方面是处理及使用。^①在消费中,人们总说生产提供了资金和使用者,就像是出租人虽没有拥有权却有使用资金的运营权。但只有当其用来表示语言知识和言说行为之间的关系时,区分才是明显的。—系列的问题与战略只能在此产生,尤其是自巴希蕾(Bar-Hillel)的工作以后,使我们能够在语言研究中(在符号过程或符号语言学内)开创—种独特的、针对使用的区域(称为语用学),明确地尝试了索引式的表述(indexical expressions),也就是,“离开了对使用语境的了解,词句的意义就不可能得到确定”^②。

我们随后应该回到解释整个日常实践(语言的使用)领域的问题中来,从这点—来看,只需注明它们是以阐释问题^③作为基础。通过对与环境相关的行为进行定位,“语境”就集中关注这些特点,来阐述言说行为(或语言实践)和它的效用。阐释提供了一个这些特性的模型,但人们在实践(步行、居住等)迎合(entertain with)非语言系统中也能发现这个模式。阐释预先假定:1.语言系统是通过言说行为得以实现的,即使某些潜在的可能性现实化(语言是言说行为中唯一的真实);2.语言属使

① 赖尔:《使用、用法和意义》,见《意义理论》,帕金森编(牛津,1968),109-116页。已运用了大量的内容。

② 理查·蒙塔古:《实用主义》,见《当代哲学》,1968(1),曹蒙·基里班斯基编,佛罗伦萨,102-122页。巴希蕾采用了皮尔斯的术语,与其相等的有巴塞尔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特殊性”,雷恩巴赫“自反表达”,古德奎的“指示词”,蒯因的“非永恒性词句”等。整个风格被铭刻在其中。维特根斯坦也属于此类,他的口号是“不问意义,只要作用”,与正常使用相关联,由语言这个制度所管理。

③ 参阅《格言的解释》,同上书,18页。

用言说者专有；3.谈话者的存在（真实或虚构）构成了叙述契约或正式的演讲（一个人对他人进行言说）；4.通过“我”这个言说者的行为建立了当下，相应的，“当下就成了时间真正的源头”^①，暂时性的形成（当下建立了之前与之后）和对世界来说的当下一“现在”都有赖于此。

这些原理（认知、挪用、关系确定、时间定位）构成了阐释，使用的附加性及对“语境”的附着关系，而“语境”只有通过抽象概念才能辨认。言说行为与当下事实、特定环境、faire（一种做事、生产语言和改变关系的动力学的特殊方式）都是不可分的，同时，言说行为既是对语言的使用，也是执行的操作方式。假定所有这些使用都与消费有关，我们就能够尝试着将这些模型运用于许多非语言的系统。

然而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来阐明这些操作的特性，不是以其与所附和的系统或规则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而是在权力所限定的框架之内，其中，它们被标记并划定了能获得利益的环境。为了做到这点，我们必须从原先参考的语言学框架转换到政治学。与我们相关的战争或游戏是在强者与弱者之间进行的，而“行动”对后者而言才是可能的。

战略与战术

作为未被承认的创造者、自我行为的诗人、工具理性丛林中的开拓者，消费者描绘出了类似于德里根(Deligny)^②所说的“漫游曲线”(lignes d'erre)。他们所勾勒出的“不确定轨道”^③显然是无意义的，因为这与他们所穿行的、已建构和书写的预制空间并不贴和。在由系统的组织技术所规范的空间内，他们是一些保持着不可预测性的词句。虽然是以现有语言

① 参阅艾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的问题》（巴黎，1974），卷二，79-88页。

② 费迪南·德里根：《飘忽的效能》（巴黎，1970），用这个词来描述和他一起生活的孤独的年轻人的轨迹，书写犹如在丛林中游移、徘徊，无法再在语言的空间中形成道路。

③ 参阅《非确定》（下），199页。

► 《匹兹堡》系列，
史密斯，
1955-1956



中的词汇（来自电视、报纸、超市或城市博物馆）作为材料，虽然仍然遵守规定的语法形式（进度表的时间模式、空间性的词形变化等），这些“穿行者”在这个他们已渗入的系统中还是保持着他者的姿态，并描绘出了不同的兴趣和欲望的狡诈的战略。他们循环着、来回奔波，在被强加的地域中泛滥、漂流，正如巨浪忽然涌入了既定规范的岩石与狭路间。

理论上在由已建构的框架所掌控的领域内，统计事实上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趋势。实际上，他是在逐渐地被侵蚀和转移的。当然，相对于各种不同的行动利用地形元素的问题来说，液体涌入固体空隙间只是个小问题。统计研究满足于分类、计算、把“字符”放到表格中、广告词、电视图像、生产成品、构建位置等，并以符合工业和经营生产的范畴和分类学进行处理、隐藏，这些研究只能抓住消费实践所使用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显然是由生产强加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而不是这些实践的专有形式，他

们私下的狡诈行为也就是“干私活”的行为。估算的可靠性依赖于他们的区分能力，把那些从巨大的整体产品中选取出的碎片组成新的故事，但根据自身的标准的话，这种分析能力又会削减了其描述战术轨道的可能性。

人们只会考虑什么是被使用的东西，而不是使用的方式。荒谬的是，后者在编码和普遍的清晰的领域中却是不可见的。这些潮流在各处泛滥的唯一效果（消费品的数量和地点）就是保留了可见性。但他们的循环是不可见的，只有在他们所经过和侵蚀的客体身上才能依稀可辨。消费实践是所谓的社会幽灵。就像过去时代的“精神”，它们构成了各种可能性，并隐藏了生产活动的条件。

为了说明这些实践，我要求助于“轨迹”^①的范畴。用它来表示一种穿越空间的时间性的运动，也就是它所通过的一系列历时性的点的集合，但并不是这些点在空间中所构成的、被认为是同时态的或者是非历时性的图像。事实上，这种描述是不恰当的，恰恰是因为轨道是被绘制的，时间和活动才被缩减为一直线，这样就能通过眼睛和阅读在一瞬间将其作为整体来把握，这正如把人们在城市中穿行的小路，投射到地图上变成线条的情况一样。无论这种“平面化”会多么有用，它都会将场所的时间性关节点转化为空间系列上的点，图像取代了操作的场所。可逆转的符号（一旦被投射到地图上，就能从两维来阅读）将取代那些与特定活动和“机会”不可分的实践，而这种实践又是不可逆的（既不能回溯时光，也不能再获得已失去的机会）。那么，平面化就是取代行动的记号，代替执行的遗迹，只是他们的剩余物，是抹去后的印记。照此假设，以一物（记号）去取代另一物（必要的操作）就是可能的。支持缩减的类型的说法是值得仔细推敲的，即认为一个管理空间的功利主义者就是要使之有效。

战略与战术的区别似乎提供了一个更充足的基本性的概述（schema）。所谓战略是指权力关系的算计（或操纵），一旦一个具有意志

^① 参阅《非确定》（下），199页。

和权力的主体（一个企业，一支军队，一座城市，一所科学机构）能够被分离出来，这种算计就得以可能。它假定存在着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被限定为自己的所在，而且可以被当作一个根据地，由此它得以控制与在他者的关系，这些在他者包括顾客或竞争对手、敌人、包围城市的乡村、研究目标或对象等，它们构成了一种目标或威胁。战略的每一合理化运作在经营自身时，首先是要寻求从周围环境中划分出自己的地盘，这个地盘也就是它自己的权力和意志的地盘。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称之为一种笛卡尔主义的态度：即努力要在一个被他者的无形权力所蛊惑的世界上划定自己的地盘。这也是现代科学、政治和军事战略的典型态度。

战略在自己专有之地和他者之地之间制造的断裂伴随着几个重要的后果：

1.“专有”是场所对时间的胜利。它允许把已获得的优势资本化，为将来的扩张作准备，并因此在考虑到环境的多变性时，给予自己一种确定的独立性。这是通过建立一块自己的地盘来掌握时间。

2.它也通过视觉来掌握场所。空间的分割使一种全景实践成为可能，这种全景实践从某一个地方出发，在那里眼睛可以把外部力量转化为可以观察、估量的对象，从而把它们控制或“包容”在其视域之内^①。能够看到（很远处）也就是能预测未来，通过对空间的读解，跑在时间前面。

3.依据知识把历史的不确定性转变为可读解空间的能力来界定知识权力的定义方式将变得合法化。然而在这些“战略”中辨认出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可能会更为恰当，这种知识是由其为自己提供地盘的力量来支撑和决定的。因此，军事的或科学的战略总是以建造它们自己的地盘为其肇始。换言之，这种知识的前提条件是一种确定的权力，这种权力并非只是知识的结果或是其属性。权力使这种知识成为可能的同时也决定了它的特

^① 根据根据约翰·冯·纽曼和奥斯卡·莫根斯特恩的《游戏和经济行为理论》第三版（纽约，1964），“当其他战略被包含在内时，实际只有一种战略”。

性。权力在这种知识中并借助于这种知识来进行自我生产。

战略的连续性轮廓将一种确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引入这正式的概述中，并且其与特定的、合理的历史构造的连接点也被阐明，与之相比，战术就是由专有地点的缺席所造成的故意行为。因而也没有什么客观的分界线提供自主所必需的环境。战术的空间是他者的空间。它必须在被强加的领域内继续参赛，而且规则是由外在的权力所规定的。退一步说，它无法在这个撤销的、深谋远虑的和聚集的情况下获得保持独立的方法：正如凡·布吕洛所提出的^①，它是在“敌人视野中的”策略，同时也是在敌人领域中的策略。因此，在区域性的、可见的、客体化的空间内，没有了从整体上规划总战略及观察对手的选择权。运行是在一个孤立的空间中详细进行的。虽然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空间来建立基地，储藏战利品，也就是不能保有自己的胜利，它依然是利用并依靠了各种机会进行突袭。可确定的是，这种无进展性反而给予了战术以易变性，但是，易变性是必须接受活动所提供的机会的，在任何假定的时刻，抓住任何可能性以供己用。它必然警惕地利用那些在所有权的监视下所显露出来的，那些特定连接点间的裂纹，侵入其中，并制造了惊奇，出现在最不希望被见到的地方，这就是一种狡诈的犯罪。

简而言之，战术是弱者的艺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在他的讨论诡计的著作《战争论》中指出了这个事实。权力增长越大，它所允许自身动员的诡计方式也就越少：为了形象而部署大量的力量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形式化的“情感表露”常常是无用的，“这必然的讽刺的严重性使得直接行动极为紧急，而没有给游戏留下任何空间”。一方部署了他的力量，一方不会去冒伪装的危险。权力是由相同的可见性来界定的。相比而言，欺骗术对于弱者而言更为可行，而且往往是作为他“最后的依靠”，也是唯一的可能性：“战略家所掌握的力量越弱，那么其运用诡计的可能性也

^① “战略是在敌人的视野之外的军事行动的科学；战术，则是在视野内。”（von Bülow）

就越大。”^①我将之理解为：更多的战略转变为战术。

克劳塞维茨也将诡计与机智相比较：“正如机智包含了一定数量的与理念及概念相关的骗术，同样诡计就是一种与行为相关的骗术。”^②这说明了一种模式，即战术是突袭规则的，但实际上，战术只是骗术的一种而已。这种“推拉术”（pulling tricks）的艺术是抓住特殊时机的意识。通过弗洛伊德以机智来阐发的程序，^③战术非常鲁莽地将不同的元素并列在了一起，其目的在于能突然产生一种灵光，对场所的语言进行不同的阐释，并试图打动听众。在系统的框架内有各种捷径、碎片、裂缝和侥幸成功，消费者的运行方式实际就是机智实践。

战术缺少他自己的位置，缺乏整体性视野，受到因为短兵相接而导致的盲目的限制（这将导致敏感），又有活动的可能性的限制。战术是由权力的缺席所决定的，这正如战略是由假定存在的权力构成的。从这个角度看，战术的辩证法能通过古代诡辩艺术来阐明。作为庞大的“战略”系统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早就对敌人的生产非常感兴趣，在他看来，这曲解了真实的秩序。于是，他引用了变化的、快速的、使对手惊讶的套语来阐明诡辩的基础，能够最后来限定战术，在此我将这术语理解为——用科拉卡斯（Corax）的话来说，就是“使最不可靠的论证看上去可靠”^④的问题。在其看似相互矛盾的结论中，这个公式描述了一种力量关系，这是才智创造力的起点，坚持、敏感、不知疲倦、随时准备抓住任何良机，在统治秩序的地势中四处离散，外在于那些由既定权力和所有权建立的合理性

①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巴黎，1955），212~213页；自马基雅维利开始，这样的分析也出现在其他理论中。参阅德拉哈耶，《模仿与掩饰》，《论诡计》，巴黎，1977（1），55~74页。

②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212页。

③ 弗洛伊德：《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斯塔切译，伦敦，1960。

④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II，24，1402a：“使辩论中的弱者显得是强者”，罗斯·罗伯特译（纽约，1954）。柏拉图的提斯亚斯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斐德罗篇》，273b-c）。也可参考古瑟里的《智者学派》（剑桥，1971），178~179页。亚里士多德提到科拉卡斯的“技艺”与“省略三段论的场所”相关，参阅皮拉曼、奥尔布拉切斯-泰特卡：《论证策略》（布鲁塞尔，1970），607~609页。

所设立和强加的规则。

总体而言，由于权力（专有的所有权）空间的建立，战略就是一种苦心经营理论场所（系统和总叙述）的行为，使之能够阐明权力分配的自然场所的整体。战略将这三类场所整合起来，企图借助于两方的力量来牵制另一方，从而享有了空间关系的特权。至少，他们试图通过对从专有位置到每一个特定的元素都进行分析并归类，从行为结构的整合到特定的单元或单元集合，将时间性关系改变为空间性关系。在这些模型成为“科学”之前都是军事用语的。战术作为赢得相关合法性的生产活动，将时间导向了环境，即介入的精确瞬间转变为一种有利的形势，也可以是改变空间组织结构的行为迅速，或者是在行动中一系列行为之间的关系及持续时间和不同节奏间可能的交叉点，等等。在这一点上，战略与战术的差别是和有关行为行动及安全的两种历史选择（而且，这两种选择与其说是与可能性有关，不如说是与束缚有关）相对的：战略将希望寄托在抵抗之上，场所的建立会对时间进行侵蚀；战术则是巧妙地利用时间及其提供的机会，同时也利用那些介入权力基础的角色。即使是通过日常战争的艺术进行实践的方式也没有以如此清晰的形式将他们自己呈现出来，然而，它还是保持通过行为的两种方式进行区分，即侧重于位置还是侧重于时间。

实践的修辞，古老的计谋

各种理论的比较使我们能更好地区分战术和“弱者”的战争研究。通过修辞进行分析的“图形”和“顺序”在这一点上已经阐释得极其清楚了。弗洛伊德早已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并用于他自己关于才智和形式的研究当中。这些形式有口语省略和浓缩，意义双关和曲解，置换和头韵，一词多用等。^①在实践策略和修辞行为之间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相似之处。涉及

^① 弗洛伊德：《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论机智的技术》。

语法的合法性和“专有”感，也就是“专有”的普遍定义（即相对于什么不是“专有”），在这些地形中所利用修辞的那些或好或坏的诡计已经被宣告无效。他们是与场合相关的语言操作，意味着诱惑、迷茫或是颠倒受话人的语言学立场。^①反之，语法监察着术语的“适宜性”，而修辞的变更（隐喻的趋势、省略的压缩、转喻的简化等）都指向了演说者在特殊场合对语言的使用，如典礼或实际语言的战争。这是消费者力量相互作用的参照指数，依靠的是所阐释的问题。另外，虽然（或之所以）在原则上他们已被从科学论述的范围内驱逐，但是这种“言说方式”给“操作方式”的分析提供了模型的储备和假设。毕竟，他们仅仅是在战术的整体记号学内存有差异。可以确定的是，为了能解释记号语言学，思维和行动的审视艺术是十分必要的。此外，某种合理性的形成是根据专有的界定为基础的。从“易经”的六十四卦^②，或者是古希腊智慧^③及阿拉伯的呼拉舞^④，还能辨认出其他的“逻辑”。

我在此并不直接涉及语言学的构造，但要提出一些日常消费实践的思维方式，其前提都具有战术的性质。定居、走动、言说、阅读、购物和烹调都是看似符合战术性策略和突袭特征的行动：在“强者”建立的秩序内，“弱者”的智慧的诡计，在对手自己的领地内欺骗对手的艺术，猎人的诡计，花招，多种伪装，快乐的发现，既是诗意的，也像战争。

也许这些实践就是一种永远的艺术，它不只持续于一系列政治秩序的制度，而且比我们的历史回顾得更远，从而在人性的边界前形成了奇特的联盟。事实上，这些实践在伪装、诡计、假扮等方面呈现与远古的关联性，远古的某些鱼类或植物在伪装方面具有极精湛的技巧，两者具有奇特的相

① 参阅图尔明：《辩论的使用》（剑桥，1958）；皮拉曼、奥尔布拉切斯-泰特卡：《论证策略》；杜博斯等的《普通修辞学》（巴黎，1970）。

② 参阅《易经》，通过借用了由6根阳爻或阴爻组成的64卦相描述了宇宙变化的所有可能环境。

③ 德替尼、弗内特：《智性的诡计》（巴黎，1974）。

④ 参阅罗迪森：《伊斯兰教与资本主义》（巴黎，1972）。

似性。这种艺术程序在生活版图的最边缘处也能被找到，他们似乎不仅成功地超越了历史制度的战略分配，同时也突破了由同样的意识制度所造成的空缺。不必借助于语言，仍然能够保持记忆的连续性及持久性，从海洋的深度一直到我们大城市的街道。

历史同期的任何情况下，在系统的连接处，技术政治化合理性的普及与扩张似乎创造了一种碎片和实践的爆发性的成长，而原先则是由稳定的当地单位所管理的。战术现在却越来越常偏离其轨道，并与那些限制了其作用的传统的社会逐渐脱离关系，开始在那些突然间变得越来越相似和更宽阔的空间中四处游荡。消费者变成了流浪者，进入了一个过于庞大的系统之中，根本无法将自己固定于一处，同时，过去巨大的强制力量使他们不可能从这里逃离，或在别处找到藏身之所。不再有他处了，因为这一点，策略的模型发生了转换，而且正是由于其本身的成功才导致了失败。他的定义是建立在对“专有”不同于对任何其他事物的定义的基础上，但目前“专有”已成为了一个整体，逐渐地，它可能会将所有的能力耗尽在转换自身和制定一个单独的空间（正如古代宇宙的极权主义）中，那么在这个空间中就会产生一个控制论的社会，及不可见的布朗宁运动（Brownian movement）场景和无数的战术。在巨大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强制性与安全作用下，人的侥幸与不确定因素就增加了：无数的几乎是不可见的行动在质地越来越精密的场所中持续活动着，这个空间是平坦的、连续的，构成了对所有的人而言都是专有的空间。这是否早已是大城市的现状或未来？

先将策略性的数千种考古方法和关于人类蚁穴般的未来的可能性放在一边，对当下日常策略进行研究时，不能忘记其产生的起点，也不能忘记另一个极点，即可能到达的终点。这遥远的过去与未来图像所唤起的，至少是让我们能够抵抗那些最基本、但常常是排外的、强迫性的分析的影响，这些分析尝试着去描述制度和抑制的机制。在研究领域，由镇压问题所带来的特权并不值得惊奇：科学制度从属于它研究的系统，并且符合家庭故事中那些众所周知的类型（一种意识形态的批评并不能在任何方面

改变其作用,而批评仅仅是为那些本身就是制度成员的科学家增加了距离的出现);甚至增加了魔怪们那令人不安的诱惑,这些故事总是在漫长的夜晚,在家庭的火炉边被人们讲述的。但是,由体制自身进行的解释也有不足之处,即无法见到与之相异的实践和它所压制的或认为它压制的实践。然而,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实践为保有这一机制提供了所有的可能性。况且,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具有更强的抵抗性,因为其伸缩性足以适应不间断的变化。当一个人仔细地考察这短暂而又永久的事实,就会对所探索的社会的夜晚留下这样的印象:夜晚总是长于白日,黑色海洋的出现源于一系列的制度,社会经济学和政治结构就像是在海洋的无限空间中的渺小的岛屿。

调查的虚构景象并不是无价值的,即使是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但他重建了原先的“大众文化”,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将声称为历史发祥力量的转换为战术能动的无穷性。那么,在我们的视野中,就仍保持了社会创造力的结构,从而同一问题不断地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

同时,它也在避免着分析所带来的影响,就是必须要领会只有在技术性装置边缘的那些实践行为,因为在这里改变或挫败了它的手段。研究本身对现象的研究是有限的。在虚构的模式中,表现这些现象的风景画具有矫正和治疗的价值,并通过侧面的考察来抵抗变形。至少这保证了他们作为幽灵的存在。这就转向了另一个场景,也让我们注意到了这些实践经历和保留他们分析之间的关系。证据只能是荒诞的、非科学的,显然在日常战术和单一的战略说明之间的证据也是不相称的。但是,在每个人的所有的活动中,有多少是被记述下来的呢?在专家的想像或幻象与沉默的身体之间总是维持着差异。

(张艳虹 译 任晓雯 校)